

治学实践、治学经验、治学方法。内容包括：职称、姓名、曾用名、笔名、生卒年月、籍贯、家世、学历、生平事迹、社会科学活动、学术成就及其著作。对重要的科学活动尽可能较多地记载，重要的科学论著尽量注明发表时间、期刊或出版社名称，以便读者查阅。本《传略》既区别于传记专著，又不同于辞典中的小传，而介于二者之间。由于撰写者的情况不同，有的写的比较详尽，有的写的比较简略，各篇传记的规格和体例不尽相同。

6.本《传略》的社会科学家尽量配有照片。

7.本《传略》的分辑，根据组稿成稿的先后编排。辑内顺序以姓氏笔划排列。本辑共选入三十位社会科学家的传略，其中有自传十八篇。

8.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缺点错误肯定不少，恳望社会科学家、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目 录

(按姓氏笔划排列)

千家驹自传	(1)
马叙伦传略	郑懿德 (10)
马寅初传略	杨勋 朱正直 (32)
王瑶自传	(73)
王利器自传	(76)
王铁崖自传	(98)
邓文如传略	王钟翰 邓珂 (106)
华岗传略	谈宾若 (120)
杨公骥自传	(131)
杨贤江传略	潘懋元 (160)
杨荣国传略	吴熙钊 (170)
李泽厚自传	(183)
邹韬奋传略	钱小柏 (188)
张舜徽自传	(202)
陈岱孙自传	(209)
陈科美自传	(220)
郑鹤声自传	(233)
侯外庐自传	(269)
恽逸群传略	强剑表 (277)
徐中玉自传	(288)
郭沫若传略	戎 望 (296)
陶行知传略	张文郁 (318)

曾昭燏传略.....	倪波 沈道初 (336)
敢峰自传.....	(342)
韩国磐自传.....	(349)
谭其骧自传.....	(361)
蔡仪自传.....	(374)
蔡元培传略.....	李华兴 (378)
霍松林自传.....	(407)
戴逸自传.....	(420)

千家驹自传

我于一九〇九年出生于浙江省武义县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祖父是秀才，父亲是廪生，也算是书香门第。但家境贫寒，祖父以教蒙馆为生。父亲因与母亲感情不睦，自我出生后，即将我母亲遗弃。但当时社会风气是不许自由离婚的，父亲在外地工作，娶妾另成立家庭，每月仅寄回大洋十元，以维持我母子四口的生活（我有两姐）。以家贫我大姐从小给人家做童养媳。她因不满意旧式婚姻，竟于一九二五年与一恋人投奔苏俄，死在异国。我于十二岁进入金华第七中读书，吴晗便是我当时同班同学，我们同庚，因此结成莫逆之交。我在中学读了一年，便因学费太贵，转入师范读书。当时师范是免费的。一年学费连食宿在内，不过三十余元。师范毕业后，以我的家庭经济条件，本来是不可能进大学的，我母亲多方面向亲友借贷，一些同乡亲友亦以我少年老成，勤奋好学，乐于支援。故于一九二六年夏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北京大学亦在风雨飘摇之中。

在北大读书期间，我曾经两次被捕。一次在一九二八年三月被张作霖政府逮捕，后以政局变化，奉军退出关外，张作霖被炸身死，我经北大当局保释出狱。一次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参加北大学生南下示威运动，在南京被蒋介石政府逮捕，这次是集体逮捕，在南京关在孝陵卫，只关了一天便由军警押解回北平释放。

在北大我是读经济系的，但我很少上课，因为当时北大讲的

都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我自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对近代史特感兴趣。北大以自由散漫著称，不少学生吃喝嫖赌，入校专为混一大学文凭。我虽不上课，但很少出去玩，整天不在宿舍用功，便去北京图书馆看书。为了研究鸦片战争史，我曾经阅读了道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共数百卷）及东印度公司编年史（英文），后来写了一篇《东印度公司之解散与鸦片战争》一文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一九三二年夏我在北大经济系毕业。

我在学生时代便开始写文章，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及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文章，在某一刊物上发表。我指出从海关报告册来看，我国每逢抵制日货的次年，日货输入总要大量增加。这不能怪中国国民之五分钟热度，而是由于中国的民族工业太不发达。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个二三流的刊物上，无意中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看到了。他大为赏识，他还以为“千家驹”是谁的笔名，后来打听到我是北大未毕业的学生，他称赞不已，刚好吴晗是胡适的入室弟子，吴晗就介绍我去见胡适，胡适主动介绍我毕业后去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社会调查所是一个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机构，所长陶孟和先生是一个开明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我在社会调查所被指定研究中国的公债问题，先内债而后外债。半年之内我写出了一本书，名《中国的内债》（1933年社会调查所出版），约五万字，这是我的处女作（指书而非文章）。

一九三三年夏，陶孟和派我与吴半农、韩德章去广西调查经济，因此得以认识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在广西跑遍了桂省大中城市，根据调查材料，回来后写成一本书，名《广西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我又陆续在各著名报刊上（《东方杂志》、《新中华》、《申报月刊》、《中山文化教育季刊》）写了许多文章，主要是关于中国的财政问题，揭露国民党残民以逞的财政经济政策，引起读者的重视。

一九三三——三五年，我曾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翻译过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当时《资本论》中译本尚未出版，文化基金会是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为基金的，内设一编译委员会，专翻译世界名著，译者为全国知名人士。译稿每千字稿酬十元（大洋）。我因胡适之介，由吴半农译《资本论》第一卷，我译第二卷，均由英译本转译的，但因为我们两人均为初出茅庐不久的大学生，非“名流学者”，故稿费减半，每千字五元。这也远远高于当时的稿费标准。我们把译稿送给编译委员会，由该会直接送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当时我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出版。吴半农大约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三分之一，我译了第二卷的三分之二以上，我们打算分册出版。我的译稿还经徐冰同志（留德回国，1935年在北平做地下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死）对照德文本校正过。那知稿子送到商务印书馆后，如石沉大海，始终未见印出来。我去问胡适，胡适说，商务老板王云五说，要向国民党疏通一下，得其同意后才能付印，否则印出来要被查禁。结果我们的译稿非但未见出版，连稿子也不知下落，我们的心血白白付诸东流了。

一九三四年我又兼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中国近代财政问题》，这是四年级的选修课。本来，我是一九三二年的北大毕业生，一九三四年我回北大教课，四年级的学生都是我的北大同学。北大学生素以调皮著称，他们对英、美留学回国的教授也常常挡驾，我当时不满二十五岁又刚大学毕业不久，结果非但没有被拒绝，还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一九三六年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机构亦由北平迁往南京，我亦随同去了南京。到南京后，我参加了救国会的活动，与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诸同志成立“南京救国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救国会领袖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李

公朴、王造时、沙千里）事件，当时我正在上海参加全国救国会的一次会议。“七君子”事件发生后，我赶回南京，布置善后，不久南京的孙晓村、曹孟君亦被捕。得知消息后，我便到一个朋友家里躲藏起来，住了几天，情况不断的恶化，沈钧儒先生特地派他的儿子秘密来看我，告诉我他父亲被捕后的情况⁵。我想，在朋友家里躲藏终不是长久之计，恰好这时我的好友吴廷璆同志从日本京都大学毕业回国，在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我决定去他那里住一个时期再说。在往青岛的途中，听到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的消息，即著名的“西安事变”。到青岛不久，我去访问一位在胶济铁路任总稽核的朋友，当然我不便告诉他是来青岛作政治避难的，只说趁寒假之便，来青岛游览。那知这位朋友，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冒冒失失地向《青岛日报》发了一条新闻，说“经济学家干某某来青岛调查经济”，并且他还介绍我去见国民党青岛市市长沈鸿烈。我真是哑子吃黄连，哭笑不得，这样一来，我在青岛的行踪便被公开出来，再也呆不下去了。到哪里去好呢？我想起广西来，当时广西是与南京唱对台戏的，处于半独立状态，安全没有问题，广西教育厅长邱昌渭，原为北大教授，我在广西调查经济时，他本想留我在广西工作。我打一电报给他，示意要去广西教书，他立即来电欢迎我去广西大学任教，这样我便去了广西。

广西当时的省会在桂林，广西大学校长由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兼任。在西大任教的进步教授有陈望道、邓初民、熊得山等，我被聘为西大经济系教授，薪金与陈、邓等为全校最高者。“七七”事变后，我回南京接眷，“七君子”亦已释放出狱，中共代表团于一九三七年八月抵达南京，我陪沈老谒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于其寓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年九月，我回到桂林。在我离开桂林期间，广西发生一政治案件，有王公度者原为新桂系重要骨干，乃一托派分子，据说有叛变桂系

嫌疑，被李宗仁逮捕枪决。李迁怒于西大进步教授，将陈望道、邓初民、李达等解聘。我作为一经济专家，仍保留西大教授职位，但讲马克思主义就有困难了。我建议西大成立一经济研究室，聘请几位研究员研究广西的粮食与交通问题。后来出版了两本书，一为《广西粮食问题》，一为《广西交通问题》。均商务印书馆出版。

抗战以后，大批文化人来到桂林，桂林成为抗战大后方文化重镇，我除在西大教课外，还兼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经济部副主任。此外，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原设在上海，由薛暮桥同志负责。抗战发生后，暮桥同志去解放区，农研会迁至桂林，由我负责，并主编《中国农村》月刊。我又与胡愈之、张志让、张铁生等编一份政论刊物《国民公论》，这是救国会的机关刊物。

抗战军兴，桂系与蒋介石合作。广西大学原为省立，经费由广西省库拨给，一九三九年改为国立，经费亦由广西省政府与蒋介石中央各半负担。校长一职由蒋介石推荐广西元老马君武担任。马君武是老同盟会员，但他思想反动，反苏反共，是国民党的老右派。他担任西大校长后，一再攻击我是共产党员，要把我解聘。当时重庆政府教育部长是C.C头子陈立夫，他竟以扣发重庆政府所承担的经费作为要挟，要求桂省当局解除我的聘约，我终于在一九四〇年夏被西大所解聘。适于此时，广东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闻讯，即聘我去中山大学任经济系主任。我接受了中大的聘书，惟当时中大正在搬迁之中（由云南迁回广东的坪石），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并没有开学，故我虽应聘而未到校，不久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我在蒋管区已不能立足，便流亡到香港去了。

在香港住了不到一年，便因太平洋事变发生，港九沦陷，又回到桂林。蒋介石打电报给广西当局，不让他们安排我的工作。蒋政府曾两次派人来动员我们（自香港回来的文化人）去重庆，

一次是C.C系的刘百闵，一次是与桂系有密切关系的程思远，我没有去，仍在桂林住着，但我已成了无业游民了。我靠朋友接济，同时用各种笔名在报刊投稿以维持生活。我为桂林《大公报》每周写一篇关于财政经济方面的社论，他们也每月送我一点生活费，不久日寇进犯湘桂，桂林紧急疏散，我又避难到桂东南的昭平县属的黄姚。黄姚是一个小镇，仅有人口数千，同我一起疏散到昭平县的有何香凝、陈劭先、陈此生、欧阳予倩、张锡昌、莫迺群等朋友。到了黄姚以后，以当地文化落后，连一个中学都没有，疏散到黄姚的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建议办一所中学，并自愿捐款并把镇公所让出来，作为校址。学校很快地办起来了，他们推举我为黄姚中学校长。我们又在当地办了一份《广西日报》昭平版，宣传敌后的抗战工作。

抗战胜利后，我离开黄姚去了香港，在香港办一经济通讯社，出版《经济通讯》一种，每周发刊一期，总共办了三年。同时在香港从事民主运动。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设有南方总支部，管辖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以及伦敦等地的民盟组织，我任南方总支部的秘书长，负责民盟南总的实际工作。

一九四八年底，我应党中央之邀，从香港间道北上来到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与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新中国成立后，我被任命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等职，以后又兼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院长为吴玉章、副院长有邵力子、杨明轩、聂真和我四人），一九五五年被中国科学院聘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一九五六年曾两次出国，一次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我任副总团长兼第一分团长；一次去苏联访问，我任中苏友好代表团副团长（团长为胡愈之同志）。“文化大革命”后，我靠边站了，去五七干校劳改三年。

我曾经在北京大学、广西大学、香港达德学院、清华大学先

后教过课，我担任的课程是财政学、近代财政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一九三六年南京工作时期，还为冯玉祥将军讲过几个月的课，我的讲稿被刊登在《冯在南京》一书中。

我曾经主编过《中国农村》（月刊）、《农村副刊》（天津益世报副刊，每周一次）、《国民公论》、《经济通讯》（周刊）、《争鸣月刊》（民盟出版）。

我的专门研究是：近代中国财政史，特别是公债问题与中国公债史。对《资本论》一书，我花过不少苦功，翻译并校对过大部分译稿。

我写过著作，解放前出版的有：（一）中国的内债；（二）广西经济概况；（三）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四）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五）中国经济现势讲话；（六）其他。

解放后出版的有：（一）新财政学大纲；（二）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三）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四）谈谈商品；（五）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六）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七）中国社会经济讲话；（八）中国货币发展简史（人民出版社，印刷中），等等。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叛徒”、“反动学术权威”，挨了群众的批斗。他们认为我的著作都是“放毒”，我气愤之余，就把我全部著作烧掉，有的当废纸卖掉。因此我现在手头连一本我自己的著作也没有，上述的书名是凭记忆的，错误及遗漏在所不免。

在解放以后，我还和范文澜、陈翰笙同志以“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的名义主编过《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一套丛书，材料来源主要是海关所存的英文档案，已出版了十多种（中华书局出版）。这些材料是极有价值的，因为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由帝国主义的洋人担任，我国关税收入占全国收入百分之三、四十左右，总税务司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贸易，操纵中

国的政治，有太上财政总长之称。这些档案都是第一手资料，首次发表的。范文澜同志对这批材料评价极高，谓为经济史资料中之瑰宝。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项工作也受到批判，谓为替帝国主义作宣传，这项工作也早就停止了，至今没有能恢复起来。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某一次全国政协大会上，我们几位研究经济的朋友（陈翰笙、彭迪先、沈志远、吴半农等）在大会上做过一次联合发言，我们主张开放农村集市贸易以活跃经济。这个联合发言稿是由我执笔，并且由我代表他们上台去讲的。那知过了三年之后，当全国政协大会一九六五年开会时，有一领导同志被授意发言，说有民主党派成员上次借政协大会讲坛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要挖社会主义经济的墙脚。他虽未点我的名，但大家都知道这是针对我而说的。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写经济方面的文章了，因为经济领域的禁区是很多的，经济问题是很敏感的，如果谈经济问题而不合领导上的意图，有时是会被扣上各种各式的帽子的。

马克思在批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英法资产阶级经济学时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巧的斗争，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称这种经济学家为“庸俗经济学家”。如果我们把上面马克思所说“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这句话中的“资本”改为加引号的“无产阶级专政”，那是完全可以适用于我国的某些经济学家的。为什么我国的经济比例长期失调，经济问题堆积如山，左倾路线长期得不到清算和克服，长达二三十年之久，而始终看不到一篇高水平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济文章，这与我国经济学界的庸俗作风是分不开的。我知道有些朋友，他们写经济文章，所考虑的首先是政治上不要犯错误和如何更好地配

合当前宣传工作，而不是研究客观的经济规律，或根据调查材料实事求是地提出科学的建议或意见。同一个人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矛盾百出，而社会不以为怪，反被捧为经济学权威。要使中国的经济研究有一个飞跃发展，非抛弃这种庸俗经济学不可。当然，这在某些时候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但真理与科学是不应该怕风险的。我宁可效金人之三缄其口，也不愿做一个庸俗经济学家。

马叙伦传略

郑懿德

一

马叙伦（1884.4.27——1970.5.4），现代著名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字彝初（又作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年号石屋老人，浙江杭县（今余杭）人。

马叙伦高祖是农夫，曾祖是鞋匠，祖父三考出身，其父承继书香。不足四岁时，其父便延师为他破蒙。从此，便开始学“小学韵语”、“大学之道”。读书之外，亦写描硃字。十岁，字就写得相当好了。这年，父亲逝世了，母亲把他交给他父亲的好友带到苏州拜刘题为师。此人教学方法很好，要求很严格，让学生熟背新旧课文，做“对子”，又教写大字小字。在他的诱导下，马叙伦“一忽儿觉得读书很有意思了”。马叙伦自幼天资强敏，精力过人，又遇上好教员，学业更有长进。后进了故乡养正书塾，是一班的“翘楚”。文史皆优，星期做文，一连考上七次第一，成了学校的特班生。他和另外两名同学被称为学校“三杰”，和其他五名同学被称为该校“六君子”。十六岁那年，历史学家陈介石任历史教员，给他启发了革命思想。读了王夫之的《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明季稗史》中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书，陶铸了他的思想。由于清政府日见腐败，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使他产生了强烈的爱国革命思想。

十七岁时，养正书塾改为杭州府中学堂。他原和一些同学约定毕业后去日本学陆军，回国后好从事革命活动。不料，竟因为替同学抱不平，触怒了学正和监督，被学校除了名。这样，寡母无力抚养兄妹五人，马叙伦便到上海，开始走上社会，帮助《选报》、《新世界学报》、《政艺通报》、《国粹学报》等编辑写文，宣传革命思想。当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日本出版的鼓吹革命的刊物以及章太炎、蔡元培的演讲，都对马叙伦有深刻的影响。后参加了柳亚子先生发起的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南社。辛亥革命前，在杭州、江山、诸暨、广州等地任教。一九一一年夏赴日，章太炎介绍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在上海办《大共和日报》，章太炎任社长，他任总编辑。

一九一三年，到北京医学院专门学校任国文教员。一九一五年，北大请他到文学院任教，后为反对袁世凯图谋称帝，愤然辞去北京医专和北大的教职回上海。袁世凯失败后，蔡元培任北大校长，邀请马叙伦再任教授。他对研究中国的文字兴趣很浓，动手写作《说文解字六书疏证》。

正当马叙伦埋头写书时，“五四”运动爆发了。北大成立了“教职员会”支援学生运动，推他任书记、主席。一九二〇年，北京大中小学教师发起“索薪”运动，组织“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也推举他任主席。一九二一年，除索薪外，该会还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的口号，并以罢课相持。凡这些组织向当局谈判，所有披露文字，都出自马叙伦之手。同年六月三日，为找徐世昌请愿，他走在最前列，遭到徐世昌派出的军队的枪击，头部受重伤，被送进医院。徐世昌还扬言要向法院起诉。各校教职员义愤填膺，齐心表示：“要‘传案’大家都到！”“六·三”事件，事闻中外，得到国内教育界和孙中山的正式援助。北京军阀政府威信因此一落千丈，徐世昌也被迫下台。

“六·三”事件后，马叙伦为养病，回到杭州。他有心“激

浊扬清”改革浙江教育。经蔡元培、李大钊的介绍，被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长。不久，北京政府改组，两次出任教育次长。一九二四年，段祺瑞组织政府，马叙伦征求李大钊等同志意见，决定出任教育部代理部务。任职期间，做了一件使李大钊同志免遭逮捕的大事，他说：“原来内务部得到情报说共产党首领李守常（就是李大钊）在校活动，咨请教育部查办，我把他压下了，否则李先生不必等到张作霖做大元帅就会被捕。”

一九二三年国共合作，马叙伦被任做北京特别党部的宣传部长。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朋友们要推马叙伦当代表，他无法分身，推了张国焘等为代表。他让代表向孙中山先生转达应重视调查研究工作的意见，孙中山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意见。不久，孙中山先生扶病来京，马叙伦到车站迎接。孙中山养病期间，他亦常去看望。三月十一日晚，孙中山弥留之际，他和杨杏佛均守在身边。孙中山入殓那天，段祺瑞因怕见革命党和成千上万的青年，推说脚痛不来了，派内务总长“恭代”，激起马叙伦和群众的无比愤慨。不久，段祺瑞命唐继尧做教育总长，马叙伦毅然辞去教育部职务，再回北大任教授。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北京，马叙伦等组织了“‘五卅’惨案后援会”，由他任最高职务。同年冬天，北京学生和文化界、工商界民众两万人，在天安门宣布段祺瑞的种种罪状，马叙伦被推为大会主席。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的次日，马叙伦写了辞呈，痛骂段祺瑞而遭通缉，被迫扮成商人，潜回杭州。后因鼓动反对南方军阀孙传芳，又遭通缉。一九二七年，马叙伦和蔡元培、沈钧儒等被任命做浙江政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八年，第三次出任教育部次长，一九二九年冬辞职回杭，决心从此不再做官。半年后应邀第四次回北大任教，继续写《说文解字六书疏证》。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心境郁闷渐渐地多做诗了。一九三五年，日寇更露骨地侵略华北，北平文化、教育界的人

们，尤其象马叙伦一辈人从前曾经“慷慨激昂拚生命来革命的”更是坐不住了。在北大，马叙伦和许德珩、张申府、尚仲衣等组织教授俱乐部聚餐，讨论抗战问题。他在会上提出，北大教授应当表态，主张抗战。得到许德珩的积极附议，胡适则加以反对。第二次聚餐会，为反对胡适当所谓的“陈述对日意见”的代表，而中途退席。之后，他和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等约了各校的抗日“同志”，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并被推为主席。这时，北平各大学、中学的学生也组织起来，每日的讲演会、座谈会使得马叙伦因过度劳累病倒了。胡适乘机开评议会要马叙伦请假一年，实是迫他离开北大。马叙伦愤然提出辞职书。男女学生纷纷挽留，校长蒋梦麟退回辞职书，亲自向他道歉，并再三送来聘书。马叙伦仍决意离去，回到了杭州。

一九三六年秋，马叙伦曾到四川作反蒋抗日的宣传工作。四川从辛亥革命以后，一直是“川人治川”，四川老军阀刘湘，为保持他自己的地位，要抵抗蒋介石的压迫。抗日救国阵营方面的王昆仑等有一个不规则的反蒋抗日小组织，正在联络各方来扩大反蒋抗日的力量，逼使蒋介石对日抗战，也想要派人入川说动刘湘。马叙伦回忆：“这时，中国共产党也号召全国抗日，我们就作了决定，要人到四川去，因为我是年辈较长，并且在社会上也较有地位，他们就要我向四川走一趟。十月十一日，我离开了我的衰老多病的母亲，从杭州起身，经过南京，绕到北京，和许德珩等商洽一番。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和许德珩、杨秀峰……也有一个不规则的小组织，这个组织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运动的目标的，所以，我在南京和王昆仑讨论未来政治路线的时候，我探王昆仑的意见，他爽快地答复我是‘红’的，我才决意去四川。”

他到了四川，一方面做刘湘的工作，分析形势，晓以利害，一方面到各校做抗日的宣传，甚至只身深入蒋介石的军官学校成都分校，做抗日救国演讲。面对四千多听众，他号召在国难严

重，民族临危的时候，军人应当负起保护国家的责任。

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中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以扩大内战，企图夺取蒋介石统治权力，进一步和日本妥协。朋友们希望马叙伦再走一趟四川。从民族利益出发，他告别病重的老母，再次入川，找了刘湘，知道他已有四项主张的通电发出了，直到得知蒋介石已被释放，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才离开四川。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虹桥事件相继发生，一时国难深重，狐鼠登台。马叙伦贫病交加，困居上海。为避敌伪迫害，变了姓名为邹华孙（邹是其母家姓，华孙意即中华民族子孙），身居斗室，伏案著述，修改《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一九三九年秋，马叙伦曾掩护过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并受其委托劝说陈公博（陈是他在北大的学生）及早回头，停止卖国活动，不能要“瓦全”的和平，然而陈追随汪精卫已定，马叙伦就不再和他往来。

抗战胜利后，马叙伦更加看清了国民党蒋介石大搞假民主、真独裁、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面目，便积极与中共地下党接触，投入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一九四五年九月八日，进步刊物《周报》创刊，唐弢、柯灵任主编，郑振铎、傅雷为赞助人。他们希望刊物能得到一、二位德高望重的耆宿撰文，傅雷首先举荐马叙伦。《周报》第二期发表了马叙伦撰写的《锄奸》，揭露了抗战时期各种汉奸的暴虐行径。之后，马成了《周报》的主要撰稿人，到该报停刊，共写了三十一篇文章。此外，他还是《民主》周刊的编委之一，配合民主运动，为《民主》、《文萃》、《新世纪》、《新文化》、《文汇报》等报刊撰写了将近四十篇文章。一九四六年，他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他同许广平、周建人、林汉达、郑振铎等十五人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和许广平、林汉达等五人当选为常务理事。随后，他和郑振铎起草，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